



毛泽东与张国焘

○陶朱问

运动的领袖。

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李大钊对思想激进、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的张国焘很是器重。

这天，踌躇满志的张国焘再度来拜访李大钊。

闻听张国焘来访，李大钊亲自立于门边，迎接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张国焘的身影刚闪进四合院，李大钊便上前一把拉住张国焘，惊喜地叫道：“特立（张国焘字特立）！”

两人走进内室。张国焘突然微微一怔，只见一位身穿青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留着浅平头、嘴角上突兀着一颗黑痣的青年早已立在那里。

李大钊爽朗地一笑，对那位青年介绍道：“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学。”

那青年迎上前，伸出手握住似乎有些机械的张国焘，操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对这位北大学生领袖自我介绍：“湖南毛润之。”

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

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其实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早已相识。

年长张国焘四岁的毛泽东于1918年8月来到北京，在送走蔡和森、李富春等30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后，自己留在了北京。10月，经他的恩师——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毛泽东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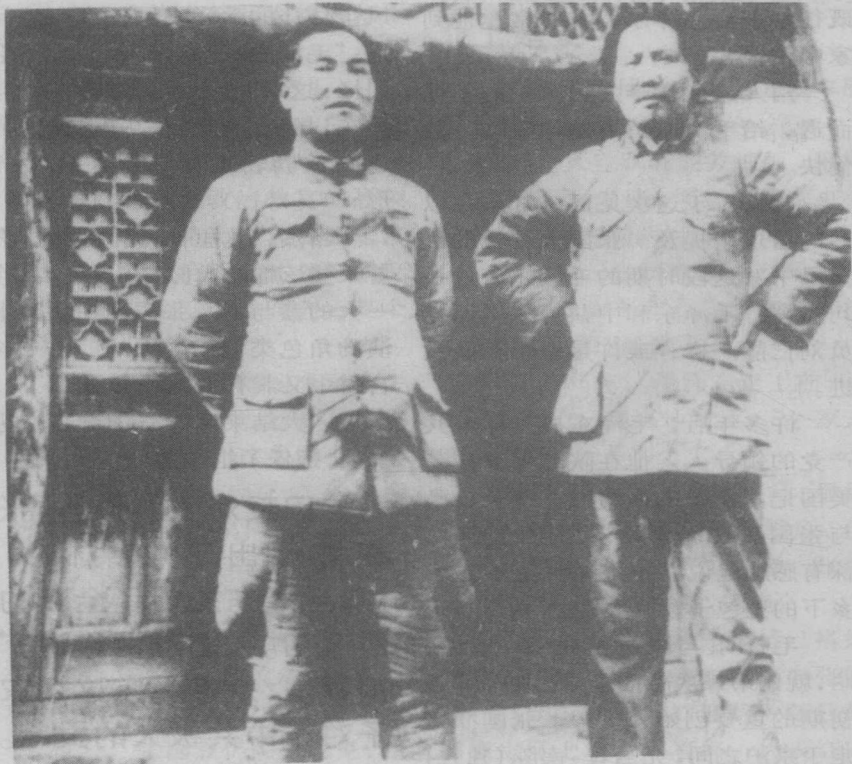
缘于此，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求教，并从他那里借阅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图书也不太齐备，可却极具吸引力，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为数不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经常被借阅一空。休息室里，三五成群的青年学生高谈阔论，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李大钊家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相遇。毛泽东操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对这位北大学生领袖自我介绍：“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毛泽东寂然坐在一旁。多少年后，他对斯诺回忆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的土包子。”

1919年2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广大进步师生因不满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一系列软弱妥协的举动，在深深的失望与愤慨中，敢为天下先，正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

刚满22岁的张国焘同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人一道成为学生



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延安。



李大钊对张国焘很看重。如果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替李大钊代为接待前来借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

毛泽东往往在这时,默默地立于一旁,捧着一本书,一面仔细登记借阅者,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几次,当一些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问题时,毛泽东忍不住走上前,主动参与辩论。然而,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除了挚友罗章龙外,这些自恃为“时代精英”、“天之骄子”的学生,对自己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图书馆馆员,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有的甚至不屑一顾。

久而久之,毛泽东窥出了其中的端倪,便退于一旁,专心地干着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他报名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旁听了一些课程。

张国焘虽然常和毛泽东在图书馆见面,但并无交往。从内心深处,张国焘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看不起还是小伙计角色的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是清楚的。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毛泽东,并时常邀他到家中相聚。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不期而遇,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却不甚愉快。

两人对于这次见面,都未在以后的著述中提及。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激进。

许多年后,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的土包子。”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晤,就比第一次融洽多了。作为建党初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员。1920年3月,陈独秀与张国焘谈到建党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毛泽东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时,特别提到了已在湖南声名卓著的毛泽东。他说:“湖南的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席话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张国焘一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据王会悟回忆,这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张国焘有着某些炫耀的成份。还有一点,作为一大的参与者,张国焘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自得中又兼有主人的成份。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共执委,担任了组织主任。

因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被逐出了中共权力中枢。毛泽东提出了全新的农民运动。张国焘评价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在革命危急关头,

被任命为七十七团团长沙党代表,但负责审查的张国焘却百般刁难。毛泽东怒不可遏,第一次与张国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922年1月下旬至2月初,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但是,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却失势了。按照安排,这次大会主要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项决议等问题。不料,身为组织主任、中执委的张国焘却固执地坚持共产党应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而不应同国民党合作,更不应全面加入国民党。他的这种观点一出台便遭到了党内的猛烈批判。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重点介绍了湖南的农民和工人运动情况。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中共三大结束后，张国焘退出了权力中枢，毛泽东则取代他与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一道组成中央局，并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前后两任中央局秘书在办理工作交接时，又一次碰头了。毛泽东主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

“润之，”张国焘见毛泽东主动来访，眼睛一亮，“老头子（陈独秀）固执己见，家都给别人当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我是同意的。但是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做法就欠考虑。我们党处在刚刚发展期间，弄不好会被国民党融合完了。”

“国焘同志，仲甫（陈独秀）先生给我谈过，组织上对你并无不信任之理，也不相信你有小组织倾向。至于中共党员的跨党问题，我也主张有条件的跨党，而不能一时地融化到国民党里去。”

“也罢！”张国焘不再争辩，“我回北京，给守常（李大钊）先生论论理，怎么也不会弄成‘左’倾组织派吧！”

1927年4月，毛泽东与张国焘再次相会于武汉。

这时，张国焘担任着中央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一直致力于农运工作的毛泽东也来到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反动的的问题。

两人的此次相晤，并不愉快。为了一名党员干部的审查问题，两人都拍了桌子。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中共早期著名党员、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际，悄悄来到武汉。

此前，曾被蒋介石誉为“最得意门生”的蒋先云，在北伐途中，一直被蒋介石留在身边，担任总司令副官兼秘书。很多重要的宣言、文稿，多出自蒋先云之手。蒋介石对他一直拉拢利诱，连军队高层的人事，也让蒋先云参与其中。一时间，蒋先云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但是，当蒋介石行将叛变革命之际，蒋先云接到周恩来的密信，便潜至武汉，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经刘少奇介绍，他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蒋先云为七十七团团团长兼党代表。

张国焘闻讯后，以中共中央代表、湖北省委书记的身份横加阻拦。他还专门派人对蒋先云进行审查，乱加指责，弄得蒋先云无所适从。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闻讯后，慨叹道：“你们共产党怎么啦？连蒋先云这样优秀的人都容不下，非得给蒋介石送回去！”

但是，张国焘并未警醒，反而在中央临时会议上喋喋不休。他危言耸听地说：“同志们请注意，蒋先云如果当了七十七团的团长，我敢保证，他肯定会拖走部队去投靠蒋介石！”

“不会的，”毛泽东把头一摇，“先云同志革命态度坚决，在广州他就不满蒋介石的很多做法。”

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蒋先云是接到周恩来主任的信后，才赶到武汉的。当前正是用人之际，蒋先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们好糊涂！”张国焘猛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那是蒋先云伪装得巧妙，我们这么多中央委员可不要被他的蒙蔽。到那时，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悔之晚矣！”

“国焘同志，”毛泽东仍耐心地劝道：“蒋先云过去同我在湖南、广州搞农民运动时，就是我的一个好帮手。这人能吃苦，能文能武，与恩来私交也不错。”

“润之，”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指着毛泽东说，“你这是调和主义。蒋先云和蒋介石抱得紧，我们审查时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这一次，肯定是蒋介石派到汉口来搞阴谋的。”

经他这么一说，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手掌重重地落在桌上。他大声指斥张国焘的武断和蛮横，决然替蒋先云辩诬。后来，经过表决，除张国焘外，大家都同意了对蒋先云的任职。

不久，蒋先云率部到河南临颍北伐前线御敌，牺牲得非常壮烈。

几个月后，因为蒋先云问题而大吵一架的毛泽东与张国焘便分手了——张国焘去了南昌，毛泽东则去了湘赣边境组织秋收起义。待到两人再次重逢时，已是八年之后了。

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不大饮酒的毛泽东破例与张国焘喝了碗烈性青稞酒。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心生异志，企图“逼宫夺权”。经历了“名山惨败”的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追随毛泽东北上延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

这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早早地来到两河口场口。

不多时，张国焘在大群警卫人员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簇拥下，威风八面地赶来了。

“国焘同志，”毛泽东走上前，一把抱住对方，高兴地喊道，“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老毛，”张国焘滚鞍下马，显得很兴奋，“你们辛苦啦！”然后，他和早已熟悉的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毛泽东随即站到一张早已搭好的简易木台上，代表党中央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辞。随后张国焘也登上木台致答辞，代表红四方面军向中央致敬，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所有在场的红军指战员，



都欢呼雀跃，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大家置办了丰盛的午餐，齐聚一堂。不大饮酒的毛泽东，破例端着碗向张国焘敬酒，饮下了满满一碗烈性青稞酒。

然而，在随后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自恃由他所执掌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意欲“逼宫夺权”的嘴脸暴露无遗。

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他力主两军会师后，队伍向西或向南发展，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则坚持一起北上的方针，双方相持不下。

在那座破旧的关帝庙里，毛泽东耐心地向张国焘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的。去年红军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就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张国焘摇着头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

最后，张国焘把手一挥，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一阵惊愕的沉默后，博古喃喃地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料，张国焘腾地一下站起身

来，指着博古的鼻子道：“你这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

“国焘同志，”毛泽东再也隐忍不住，厉声斥责道，“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老毛，”张国焘似乎余怒未息，“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不但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毫不相让，紧跟着顶过一句：“现在还不是总结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此前的遵义会议已有过总结。当务之急，红军要团结北上。这才是惟一的出路。”

“为什么要北上？”张国焘逼问道，“造成中央红军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最直接地反映到了军事上。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政治，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基于此，我们四方面军同志认为，南下川康才是红军当前明智战略之举。”

张闻天见争执不下，便以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举手表决。结果，5比1，大家同意北上。

张国焘见此情景，黑着脸，待散会后，连招呼都不打便赶回了住处。

接下来，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

服和争取。但是，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对毛泽东开始出言不逊了。他说，在中央苏区，老毛就爱表现得与中央格格不入，处处要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还要把他推出来。这个人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今后与之共事，须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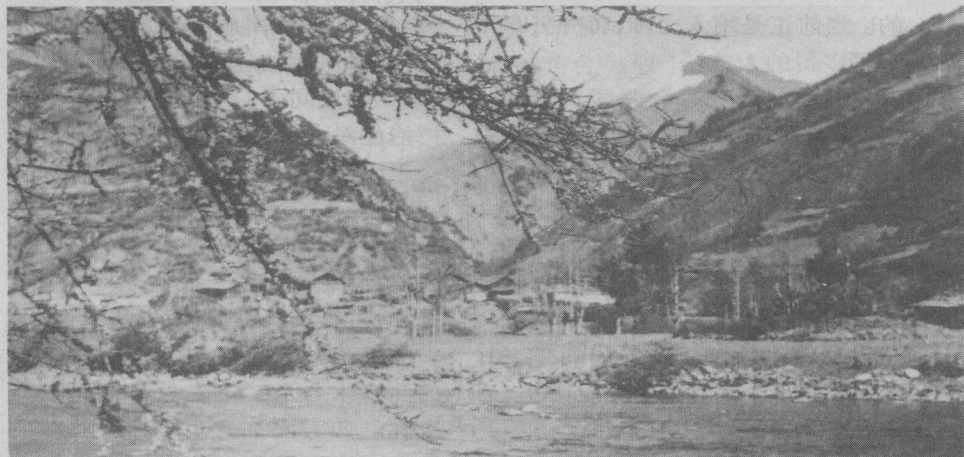
朱德当即以老大哥的身份开导张国焘，说毛泽东这个人事情想得远，看得准，本事十分了得。如果不是遵义会议上他重新出山，恐怕这支队伍早就垮了。至于个别同志有意见，那是在所难免的。最后，朱德劝道，现在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军事策略，北上是最佳途径。

然而，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他一面指示人以各种名义给中央致电，要官要权，坚持南下；一面公然称“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一方面军已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见张国焘如此张狂，便采取断然措施，在沙窝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同时，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则一意孤行，二走草地，率左路军南下川康。他提出“打到成都过年吃大米”。结果，在四川名山遭到国民党川军、中央军的联合攻击，导致了红军南下的“名山惨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部重新回头，三过草地，追随右路军的足迹，被迫北上。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少林将军钱钧义愤中走上台来，脱下鞋，打了张国焘几



两河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此举行会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下。一天清晨，张国焘被告知，他必须搬出现居的窑洞，让给刚刚归国的王明。王明到延安后再翻历史旧账。张国焘惊恐万状，终于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武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领导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草地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对于对张国的批判和清算，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并未像张国焘在自传中说的那样，“是毛泽东群众斗争弄得他在延安无法立足”。相反，毛泽东还多次替他申辩：“国焘同志是我党始创者之一，只要他认识、改正了错误就行。”

但是，张国焘对此却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他的检讨和反省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轻描淡写，让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

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怎么能随便打人，蠢么！”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都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想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道：“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结束了他叛逃的导火线。得知王明归来，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然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沉沉地点了点头。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不甚融

洽。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尔后去了鄂豫皖苏区。如今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居然主动找上门来。

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依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

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且有托派特嫌。

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变投敌后，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时过境迁，在张国焘将党的机密出卖完后，国民党便一脚把他踢开了。蒋介石“赏”了他个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闲差。他与何畏在重庆过得颇不顺心，两人曾合资办了个养鸡场，却又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1949年冬，大陆解放前夕，周恩来曾密派专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发表声明，公开认错，以便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张国焘思前想后，去了香港。在那里，《明报》主持人看中他的特色经历，连载了他的回忆录。张国焘便靠回忆录的版税维持生计。“文革”开始后，大陆的“造反派”、红卫兵扬言要到香港将他绑回大陆。张国焘闻讯后，惊恐万状，移民去了加拿大。1979年，张国焘因中风去世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